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研究

——基于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分析

王洛忠 陈宇 都梦蝶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变化及其配置对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样本,通过内容分析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呈现出稳中求进、曲折上升的趋势;在信息化领域方面呈现出由信息发展能力向信息发展环境建设的过渡性特征;在信息化落实过程中,其所涉及的政策领域方面,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出集中性与广度性相统一的特性,在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政策领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则呈现出“间断—均衡”特征。

关键词: 中央政府;信息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注意力

中图分类号: D63-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594(2019)05-0177-06

DOI:10.16354/j.cnki.23-1013/d.2019.05.026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正深刻改变着世界。中国政府亦重视信息化的发展,积极推进、提高我国信息化水平。信息化的推进、发展与国家的政策息息相关,中央政府作为信息化的主要推动者和政策的制定者,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对我国的信息化建设至关重要。因此,系统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变化,既有利于总结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也有利于为国家制定新一轮的信息化战略出谋划策。从199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涉及信息化建设至今,我国的信息化发展历经23年,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信息化各个领域是如何分配注意力的?对涉及信息化政策领域的注意力又是如何配置的?这些正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研究设计

(一) 信息化概念

信息化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信息化的内涵,目前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Daniel Bell(1959)认

为信息化是培养、发展以计算机为主的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并使之造福社会的历史过程^[1]。梅棹忠夫(1963)在《论信息产业》文中指出“信息化是通讯现代化、计算机化和行为合理化的总称”。小松崎清介等人(1967)认为,信息化是信息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并将取得支配地位的一种社会进程^[2]。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信息社会”和“信息化”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信息化”一词也进入到我国学者的视野。赵苹认为“信息化是指人们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达到较高的程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信息资源的高度共享,推动人的智能潜力和社会物质资源潜力充分发挥,使社会经济向高效、优质方向发展的历史进程”^[3]。1997年召开的首届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对信息化的定义为“信息化是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社会的历史过程。”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知识社会》认为,信息化既是一个技术的进程,又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它要求在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管理流程、组织机构、生产技能以及生产工具的变革。

由此可见,虽然不同学者和组织对信息化内涵

收稿日期:2019-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研究”(17ZDA1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洛忠(1975—),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政府治理改革和公共政策创新研究;陈宇(1989—),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政府治理改革和公共政策创新研究;都梦蝶(1994—),女,山西晋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府治理改革和公共政策创新研究。

的界定各有侧重,但一般来说均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以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为基础;②强调信息和知识在信息化中的重要性;③以提高经济和社会水平为导向;④信息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信息化是国民经济社会结构框架的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或知识性空间转移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以高科技的信息技术为手段对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改组或重新整合,通过提高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的信息与知识的含量,推动全社会达到更高发展水平的过程。

(二) 注意力概念

注意力最早是用来描述人的心理活动,即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的能力,伴随着感觉、直觉和思维等心理过程,外界现象通过主体注意进入到人的认识阶段。随着政策科学的发展,决策信息受到了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获取和收集信息的复杂性深刻影响着决策主体的决策。西蒙认为“信息并不是真正的稀缺因素,真正稀缺的是注意力”^[4],此后,学者们开始运用心理学中“注意力”的概念来分析政府决策,一方面要把握注意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要调整注意力的差异,从而达到政府注意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托马斯·达文波特和约翰·贝克认为“注意力”出现介于一个相对潜意识的搜索阶段和决策阶段之间^[5],如图1所示,注意力架起了直觉和行动之间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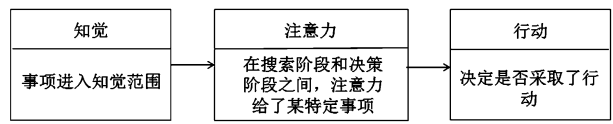


图1 注意力过程图示模型

资料来源: [美] 托马斯·达文波特、约翰·贝克著《注意力与决策》, 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第24页。

托马斯·达文波特指出注意力在认识过程中有两个作用:一是涉及信息的收集,外界信息只有通过注意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二是注意的维持能够推动人类活动向前发展。布莱恩·琼斯则认为“对注意力给予关注直接导致对动态选择的聚焦——关于人们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行选择”^[6]⁵⁸,并指出注意力是在选民偏好不变的情况下,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

笔者认为政府决策的注意力是决策主体用于关注、聚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间、知识等有限资源,同时也是确定决策议题和选择决策方案过程中需要的能力资源;是决策主体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对某类或某个社会问题作出行动与否的决策考虑,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对其关注的持久尺度。决策者注意力的变化,也将预示着决策者选

择的变化。

(三) 研究设计

本文将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研究的文本材料。国务院作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在推进国家信息化过程中所做出的各种政策安排是国家信息化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国务院对特定年度内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总结与计划安排,是一份具有施政纲领性质的重要官方文件^[7]。其中的文字表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所有公共事务领域的政策安排,信息化也包含其中。因此,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是其政策注意力分配的集中体现,能比较科学地反映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配置。

合理、恰当的界定哪些属于政府对信息化的相关表述,是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注意力研究的逻辑前提和基础。2016年,国务院颁布并实施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将信息化领域分为了三个方面,具体内容为:一是信息化发展能力。信息化发展能力是推进信息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主要涉及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和信息人才等。二是社会信息化水平。运用信息技术提高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主要包括经济信息化、电子政务、公共服务信息化、生态文明建设信息化等。三是信息化发展环境。主要包括信息化法治、网络生态和网络安全。因此,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凡是与上述主题相关的表述均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注意力的体现。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此方法作为一种“非直接介入的分析工具,有助于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能客观地对事实进行分析破解从而得出结论,而且还能处理大量且长时期的数据”^[8],因此,众多学者将包括《政府工作报告》在内的连续政策文本作为分析资料的来源。然而,由于内容分析是一种描述性的分析方法,只能比较系统地呈现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注意力的演变趋势和分配变化,无法呈现出导致这种变化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注意力的变化、转变与分配

(一) 整体趋势的注意力变化:稳中求进、曲折上升

虽然词频分析是内容分析的重要测量指标,但是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涉及的政策领域众多,往往不会对同一政策表述过多,同时信息化所包含的意义众多,词频难以统计,因而词频分析并不

能客观地反映出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故本文选择了信息化相关表述的字数及其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占的比重,作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的测量指标。笔者对国务院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相关表述做了提取,分别计算出每一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相关表述的字数及其占报告总字数的比重,并通过折线图与柱状图相结合的形式予以共同呈现,发现其年度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见图2)。信息化相关表述的字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占比增长意味着中央政府分配给信息化的注意力增强;反之,则意味着中央政府分配给信息化的注意力减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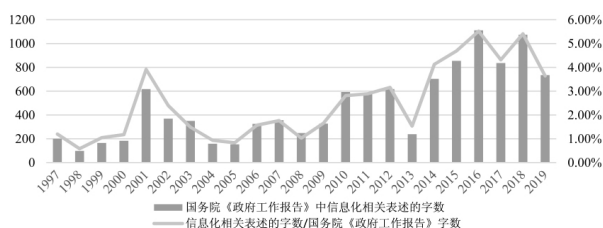


图2 1997—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信息化相关表述字数及其占比统计图

通过对图2的观察,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第一,整体呈现曲折式的上升趋势。在199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息化相关表述的字数所占比重仅为1.20%,而在2018年这一比重就增加到5.41%,足足上升了4.21%,并在2016年达到5.52%的峰值,与最低占比数(1998年,0.58%)相差4.94%。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从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然而,这一增长趋势并非是非线性增长,在某些年份注意力有所下滑,如在2001—2005年间,信息化相关表述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在此后的2008年、2013年、2017年,比重均略有降低,继年再有所回升,呈现出曲折式的波动与上升。

第二,激增与稳定共存的渐进模式。政府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强度有明显提升,呈现激增趋势,分别在2001年和2014年,而在其余时间段呈现为波动较小的平稳上升期。2001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信息化”,并通过推进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提高社会的信息化水平成为政府注意力的焦点。如在社会民生方面,中央政府提出“要在企业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社会公共服务、政府行政管理等方面广泛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把工业化和信息化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教育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发展远程教育”亦体现了信息化的全方位渗透。2014年的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则正式将“大数据”纳入信息化技术应用的领域范围,提出“设立新兴产业创业创新平台,在新一代移动通信、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赶超先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由此可见,新技术和决策环境的变化均引致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后则趋于平稳,呈现出明显的激增与稳定共存的模式。

(二) 内容领域的注意力转变: 由信息发展能力向信息发展环境建设过渡

上文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表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分析,较为客观地呈现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的整体变化趋势,但这种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无法厘清中央政府对信息化三个领域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正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信息化主要包含信息化发展能力、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发展环境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政府对信息化三个领域的注意力分配深刻影响和制约着信息化的发展。因而,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分配,本文对历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关键词”提取(见下页表1),在结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基础上,将中央政府对信息化领域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按照时间维度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97—2000年。该阶段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重心是信息化发展能力。1997年,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了推进信息化发展的表述,但主要是集中在“电子信息技术”“电子信息产品”“信息产业”;1998—200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表述的关键词也主要是“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

第二阶段: 2001—2003年。该阶段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重心是社会信息化水平。200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在企业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社会公共服务、政府行政管理方面广泛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把工业化和信息化更好的结合起来”,此后“信息化”一词就一直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2002年,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信息化水平,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

第三阶段: 2004—2013年。中央政府的注意力是信息化发展能力和社会信息化水平并重,同时开始关注信息化发展环境。这10年间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整体注意力并没有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波动,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对信息化发展能力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注意力配置也相对均衡。10年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

表 1 1997—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信息化表述年度关键词汇总表

年份	关键词
1997	电子信息产品; 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
1998	信息技术成果
1999	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产业
2000	信息产业; 信息技术
2001	信息化; 信息技术; 数字化; 网络化
2002	信息网络; 信息化; 电子商务; 电子政务
2003	电子政务; 信息化; 信息服务; 互联网站
2004	信息化; 互联网; 信息技术
2005	信息化; 电子政务; 互联网
2006	信息化; 信息技术
2007	信息化; 信息服务; 电子政务
2008	信息技术; 信息化; 电子政务; 互联网
2009	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 信息咨询; 三网融合
2010	电子商务; 信息网络; 三网融合; 信息技术
2011	信息化; 电子商务; 网络购物; 智能电网
2012	云计算; 物联网; 电子政务; 网络购物
2013	信息化; 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技术
2014	大数据; 跨境电子商务; 宽带中国; 网络安全
2015	信息消费;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互联网 + ; 智慧城市
2016	网购; 互联网 + 政务服务; 电子商务进农村; 中国制造 + 互联网
2017	政务服务平台; 数字家庭; 数字经济; 中国制造 2025
2018	互联网 + 农业; 网络教育; 移动支付; 共享经济; 智能生活
2019	互联网 + 监管; 互联网 + 教育; 互联网 + 医疗; 互联网 + 督查; 互联网 + 各行业各领域; 智能 +

资料来源: 根据 1997—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制作。

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提出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等概念。与此同时也注重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推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跨境电子商务”“宽带中国”“电子政务”等进一步发展。此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开始关注信息化的制度建设、网络文化、网络安全等。

第四阶段: 2014—2019 年。中央政府的注意力重心是社会信息化水平,同时兼顾信息化发展能力和信息化发展环境。2014 年以后,“大数据”“互联网 +”“智慧城市”“共享经济”“智能生活”等相继进入到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高整个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成为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表述的重要内容。同时,政府也在积极推进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换代升级,为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持。这一阶段,政

府还对信息法治、网络生态和网络安全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如 2014—2018 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均提到要“发展和规范网络空间,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净化网络环境。

综合以上四个阶段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对信息化领域的注意力呈现出三大特点: 一是整体上而言中央政府对信息化各领域的注意力不断上升。信息化事关国家经济社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各个领域的注意力逐年增长。二是中央政府对信息化领域的注意力从单一领域向多个领域转变。中央政府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首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信息化发展能力上,这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从单一的信息化发展能力领域,转向同时关注三个领域的发展。三是中央政府对信息化各个领域注意力的分配不均衡。信息化的推进需要统筹兼顾各个领域的发展,但政府在信息化发展能力、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环境上的注意力分配严重不均,尤其是对信息化发展环境的关注不足。

(三) 政策落实的注意力分配: 集中与广度、间断与均衡

信息化的推进要落实到具体的各个政策领域中,因此,了解中央政府对涉及信息化的政策领域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更为重要。笔者统计了 23 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政策领域,共有六个主要领域,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和政府自身建设领域等。在政治领域,主要涉及信息安全政策和国防政策; 经济领域的政策关注点则在经济政策、农业政策、产业政策、国企改革、消费政策、房地产政策、贸易政策、金融政策等; 在文化领域,主要涉及的政策即为文化政策; 在社会民生领域,涉及的政策范围包括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就业政策、扶贫政策、“智慧城市”相关政策等; 生态领域所涉及的主要政策是环境政策; 政府自身能力建设则主要是通过信息化推动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通过对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内容维度的分析,笔者发现中央政府对涉及信息化的政策领域的注意力分配情况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出发,涉及信息化的政策领域数整体呈上升态势,范围呈现出逐步扩展的“涟漪式”渗透趋势。通过对 23 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具体政策年度频次的统计(见下页图 3),笔者发现其政策数量与范围呈现出波折式扩展,由 1997 年的 2 个扩展至 2019 年的 9 个政策领域,数量上增加了 7 个; 其中,最高峰值为

2016 年的 14 个,比 1998 年的最低值(1 个)增加了 13 个政策领域,在数量方面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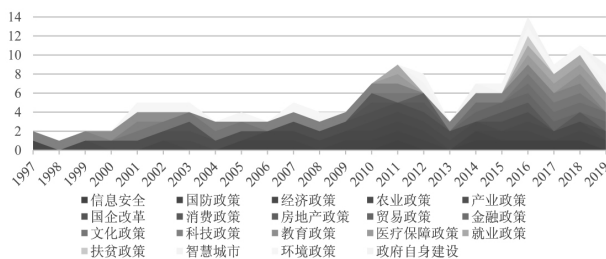


图3 1997—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具体政策年度频次统计图

在范围方面,笔者通过逐年统计五大政策领域及其他领域的政策领域次数(见图4),发现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具体政策领域从一开始以经济政策、科技政策等为主,逐渐渗透至农业政策、产业政策、政府自身建设等多个领域的多项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信息化在经济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发展等如同投入平静湖面中的几个石子,激起的涟漪由中心逐步向周围的水域扩散,所波及的数量与范围愈加广泛,呈现出“涟漪式”渗透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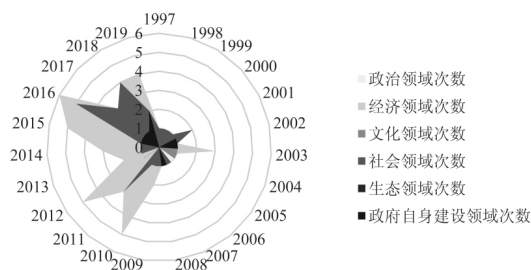


图4 1997—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各政策领域年度频次统计图

第二,从涉及信息化的某一政策领域出发,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所涉及的政策领域的注意力分配具有“间断—均衡”的特点。中央政府对于各政策领域的信息化所分配的注意力强度“波动”幅度较大,并在具体的某一政策领域时呈现出“间断”式特征。如信息化在经济政策中有所提及的时间点有1997年、2002年、2006—2012年、2015—2016年、2018—2019年,而在其余年份未有涉及,呈现出注意力持续性不强的特征。这一特征符合注意力分配的一般规律,即注意力难以在某一领域持续集中,其持续程度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如外在环境的变化或内在的自我调整等。

第三,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所涉及的政策领域的注意力分配以经济、社会民生领域为侧重点。通过对23年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不同政策领域比重统计(见图5),笔者发现中央政府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领域与社会民生领域,而在政治领域、文化领

域、生态领域和其他领域注意力分配较为不足。由图3可知,信息化最先于经济与社会民生领域发迹,经济领域与社会民生领域的信息化革新成为中央政府注意力的主要集中地。而随着国际信息环境复杂化的加剧与国内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各领域公共问题的解决有了更多的可替代性方案,信息化途径也成为解决许多新问题的明智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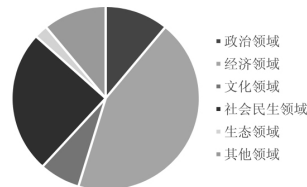


图5 1997—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信息化的政策领域比重统计图

三、分析与结论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种纲领性的政策文本,蕴含了中央政府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价值准则,也是中央政府注意力分配的重要体现。这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政府重视什么,将向哪个领域投入资源,因此,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分配对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以上的分析,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分配并不是无章可循的,而是呈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

第一,在数量方面,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呈现出稳中求进、曲折上升的特点。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信息化的相关表述字数所占政府工作报告的比重作为衡量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整体注意力的重要指标,从数据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从1997年的1.20%上升到2018年的5.41%,增长近四倍,但这种注意力的增长并不是线性上升的,而是平稳、突变、曲折式的增长。1997—2003年是一个增长时期,2004—2014年是一个平稳而又相对曲折的阶段,2014年以后则急剧增长,每个变化的节点都是政府的换届时期,而在每届政府任期内对信息化的关注则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特点,因此,决策者的偏好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央政府对信息化的注意力分配重要因素。此外,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信息化的相关表述中一些词也表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如2001年的“数字化”、2014年的“大数据”、2016年的“互联网+”等,这种时代性的背后是政策环境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中央政府对信息化注意力的分配。

第二,在内容方面则呈现出由信息发展能力向信息发展环境建设的过渡性特征。根据中央政府对信息化领域的注意力变化的四个阶段可以发现,中

央政府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首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信息化发展能力上,这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完善,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从单一的信息化发展能力领域,转向同时关注三个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对信息化发展环境的关注,如信息安全的制度建设问题、信息应用的法律环境等,目前虽稍显不足,但转型过渡趋势已初现端倪。

第三,在信息化所涉及的政策领域范围上,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出集中性与广度性相统一的特点。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政府在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面临着两个困境:一是无法将注意力同时集中于多个目标;二是无法将注意力贯穿始终。信息化的推进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它包含了信息化发展水平、社会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发展环境,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又涉及众多的政策领域,中央政府很难较为均衡地将注意力分配在各个领域,因而呈现出相对集中的特点,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较为关键的领域内,但同时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又具较强的弹性,能够将其所觉察到的涉及信息化的相关领域纳入其视野范围之内,呈现出一定的广度性。

第四,对于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政策领域,中央政府的注意力呈现出“间断—均衡”的特点。琼斯和鲍姆加特纳提出了分析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理论”,较为清楚地解释了政策的渐变和突变情景。同时琼斯也认为,“有限的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转移,是导致政策稳定和政策突变的基本原因”^{[6]18},政府倾向于将有限的注意力分配给政治压力大、社会关切的议题。中央政府对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

政策的注意力分配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均衡”的特点,如中央政府在2000年首次提出要推进文化领域的信息化,连续5年都在推进这项政策的发展,处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状态,但在2006以后却未再提及,直到2011年又重新进入到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这种注意力的变化不仅是一种回归,更是对政府关注焦点的重新触发,是一种认知的循环。琼斯认为,政府的注意力和认知循环与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因此,政府这种“间断—均衡”式的注意力分配使得涉及信息化的某一具体政策领域呈现出渐变和突变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12.
- [2] [日]小松崎清介,伊藤阳一,鬼木甫.信息化的由来及其经济含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6-89.
- [3] 赵苹.信息化——中国农业的挑战与机遇[J].农业信息探索,1998(5):6-9.
- [4] 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46-149.
- [5] [美]托马斯·达文波特,约翰·贝克.注意力经济[M].谢波峰,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3.
- [6] [美]布莱恩·琼斯.再思民主政治中的决策制定:注意力、选择和公共政策[M].李丹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 张海柱.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海洋政策演变——对1954—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3):105-111.
- [8] 刘伟.内容分析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行政管理,2014(6):93-98.

On the Atten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to Informationiz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Council from 1997 to 2019

WANG Luo-Zhong, CHEN Yu, DU Meng-Die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o 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ization. Taking the relevant statements of the informatization in the “State Council Work Report”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from 1997 to 2019 as samples, it is found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that, as a who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attention to informatization shows a trend of steady progress and upward spirals; It also present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from capacity to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zation; in the policy areas involved in informatization, the attention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centration and breadth; Specificall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iscontinuous – equilibrium”.

Keywords: Central Government; Informatization; The State Council “Government Work Report”; Attention

(责任编辑:王华薇)